

从训到育：上海犹太青年组织“贝塔”的扩张与演变

顾荻飞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南京 210046）

摘要 20 世纪 30 年代，随着大批社会活动家来到上海，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上海成为犹太复国主义史上不可忽视的前沿阵地。“贝塔”作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修正派的青年组织，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它是一个政治组织，却也超越了政治组织的内涵，以积极的姿态融入了上海犹太青年的日常生活中。同时，哈尔滨犹太人移居上海，也给上海“贝塔”带来了不一样的活力。

关键词 上海犹太人；贝塔；犹太复国主义

1 上海犹太难民概况

“上海犹太难民”并不是现代学者创造的词汇，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申报》、《以色列信使报》、《黄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等等都开始关注这一批群体。上海犹太难民以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为主，一部分中欧犹太人在希特勒上台之后开始涌入上海，在此之前，他们与中国上海几乎没有任何联系，一部分犹太难民来自哈尔滨犹太难民区，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分批来到上海。然而开埠以来，由于上海的过度城市化和城乡畸形发展，大量游民积聚上海，很多犹太人语言不通，也缺乏自主生活能力，只得住在收容所里，难以自立，继续成为逃亡难民。这些难民男性更多，年龄偏大。到 1939 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为收容所内 70% 的难民提供住宿，将工部局辖治下的房屋充作难民医院。^①

关于上海犹太难民，最重要的就是难民的人数问题。

王健认为二战期间，上海接纳了至少 25000 名犹太难民。^②熊月之在《上海的外国人·序》中解释上海犹太人大概的人口流动，“从 1933 年到 1941 年，上海先后接纳了 3 万多名来自德国及德占地区的犹太难民，其中除了约 5000 人经上海去了别处以外，其余 2.5 万欧洲犹太人一直在上海生活，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些犹太难民有 4000 人住在法租界、1500 人住在公共租界，其余住在日本人控制的虹口一带。”^③然而这三个数据缺乏可靠的依据，尤其与海外学者的研究相去甚远。玛西亚·李斯泰诺在《新前沿：东亚的帝国主义新社团》一书中认为“到了 30 年代末，上海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已达 4000-8000 人”，数字 4000 是《以色列信使报》1937 年 3 月 12 日第 17 页的数据，而 8000，可能是将塞法迪犹太人也计算进去。^④约西·卡茨对上海犹太人的数量持保守看法，他援引了一份 1947 年的报告，报告中显示上海的犹太人总体数目很少，长期居民不超过 250 到 300 个家庭。^⑤美国学者大

①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1939 年，第 426 页。

② 王健：《上海犹太人与抗日战争》，《上海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05 年。

③ 熊月之、马学强、晏可佳选编：《上海的外国人 1842-194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 3 页。

④ 熊月之、马学强、晏可佳选编：《上海的外国人 1842-1949》，第 283 页。

⑤ Yossi Katz, “The Jews of China and their Contribution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Jewish National Home in Palestine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6, no. 4 (July 2010), pp. 543-554.

卫·克兰茨勒在《上海犹太难民社区：1938-1945》中提到，1943年2月，日本当局在上海虹口区设立隔离区之后，大约有14000-16000名犹太人被关进隔离区，但是仍有部分无国籍和苏联籍犹太人并没有被关入隔离区。

上海犹太人的数量是一个难以回答准确的问题。第一，资料的缺乏。上海犹太人的构成非常复杂，而《以色列信使报》、《申报》等等记载的多为德奥犹太人，波兰犹太人、捷克斯洛伐克犹太人的相关记录很少，无国籍犹太人的统计也模糊不清。从零星的资料中可以找到犹太难民的迁移踪迹，例如，1931年，随着日本不在中国东北动作不断，哈尔滨犹太人辗转南下，或出洋或赴沪避难。根据犹太人人口统计表，30年代哈尔滨犹太人的数量持续下降，从1931年的2600人到1937年的1100人，与上海犹太人数量增加相互对应。^①第二，管理的限制。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记录是重要史料，但是也只记录了一两处的犹太人，难以摸清全部的犹太人数量。战后，上海工部局档案在移往美国的过程中多有损漏。第三，战乱的影响。由于亚洲太平洋战场战局的扩大，部分犹太人来到上海之后并未向救济委员会登记，人口流动非常频繁，给统计制造了很大的困难。1941年到1942年上海公共租界疫病的横行，也使得一部分犹太人就“失踪”在异乡。限于种种因素的干扰，下表的统计仅仅是1938年之后的来自欧洲的犹太难民数量。^②

年代	人口	资料来源	备注
1937.3.17	4000人住在法租界，1500人住在公共租界。	《以色列信使报》（以下简称《以》）1937年3月12日第17页，转引自熊月之等选编《上海的外国人1842-1949》第283页。	以上为1938年赴沪中欧犹太难民潮之前的基础人数。
1938.11.24	460	《以色列信使报》1938年12月16日，第35卷，第7页。转引自《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第1卷》（以下简称《来华》）第197页。	从1938年8月15日开始计数。
1938.12.31	1384	《以》1939年1月20日，第35卷，第10页。转引自《来华》第200-201页。	包括148个儿童。
1939.1.30	2305	《以》1939年2月17日，第35卷，第11页。转引自《来华》第202页。	其中15人从苏联转道而来。2305人中1905人需要救济，占比82.6%。
1939.2.10	3155	《以》1939年2月17日，第35卷，第11页。转引自《来华》第202页。	部分为预测性数据。
1939.3.17	4500左右	《以》1939年3月17日，第35卷，第12页。转引自《来华》第203页。	向救济委员会登记的人有3945，占比87.7%。
1939.4.27	8400	《以》1939年5月5日，第35卷，第2页。转引自《来华》第205页。	救助人数占比约80%。
1939.6.4	10506	《以》1939年6月9日，第36	到1939年底，公共租界收容所共收容犹

① 李述笑、傅明静：《哈尔滨犹太人口、国籍和职业构成问题探讨》，《学习与探索》2001年第3期。
② 《来沪犹太难民人数考》一文中也征引《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做了梳理，本文的表格在此之外另行补充一些数据。《来沪犹太难民人数考》，潘光主编：《来华犹太难民研究（1933—1945）》，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

年代	人口	资料来源	备注
		卷，第 3 页。转引自《来华》第 207 页。	太难民 2332 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1939）》，第 425 页）
1939.7.14	超过 12000	《以》1939 年 7 月 14 日，第 36 卷，第 4 页。转引自《来华》第 207 页。	
1939.8.7	超过 16000	《以》1939 年 8 月 16 日，第 36 卷，第 5 页。转引自《来华》第 208 页。	工部局的数据略少，为 15000。《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1939）》，转引自《来华》第 103 页。
1939.9	17000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1939）》。转引自《来华》第 204 页。	到 1939 年年底时，收容所救助犹太难民为 2332 人，若仍以 17000 为基数，救助比例为 13.7%，实际比例应更低。
1939 年底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1939 年，第 60 页。	工部局限制犹太难民进入租界。
1940 年底	18000-19000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1940）》。转引自《来华》第 105 页。	向救济委员会登记的难民占比约 52.5%-55.6%。收容所救助人数为 2115 人。
1941 年底	20000	《申报（上海）》1942 年 1 月 22 日，第 3 版。转引自《来华》第 176 页。	由于日本将日本本土的犹太人驱赶至沪，上海犹太人数量又经历一个小型增长。但是 1941 年至 1942 年上海公共租界烈性传染病流行，一些犹太人因此殒命。收容所救助 2093 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1941 年）》，转引自《来华》第 106 页。
1942.7	德裔 9410，奥裔 13，波兰裔 842，其他犹太人 586	《警察月报》（1943 年 7 月），转引自高纲博文：《上海日侨社会史》第 163 页。	
1943.7	德裔 10049，奥 1100，波兰裔 829，捷克裔 183，其他犹太人 1177	《警察月报》（1943 年 7 月），转引自高纲博文：《上海日侨社会史》第 163 页。	
1945.12	虹口的外侨为 28681 人，12 月为 28691 人。共有 73 名“犹太”国籍人出境。	《上海市年鉴》（民国三十五年），《上海市各区外侨户口统计表》，G-23、G-25。	由于日本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将“敌对国”外侨关押于虹口集中营，几乎所有中欧犹太人关押于此，但是无国籍犹太人以及持有苏联护照的犹太人不在此列。

表格 1 1938 年至 1945 年离欧来沪犹太难民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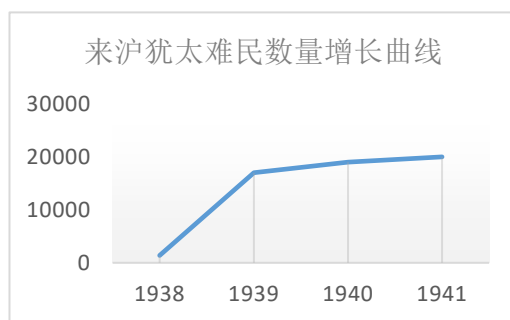


图 1 来沪犹太难民数量增长曲线

2 “贝塔”问题概述

上海犹太人作为一个特殊时期的特殊群体，在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得到了中国学界的重视。对比来看，哈尔滨犹太人存在时间更长，在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史上产生的作用更大，研究相对更加细节化。^①而上海犹太人组成更为复杂，这种特殊的流散时期可以作为典型案例，研究外界战争压力对共同体形成的催化作用。中外学者对于上海外侨的研究颇有建树，对还原上海犹太人的生活状况、思想流变等方面做了很大的贡献。^②在很多城市史的研究中，上海的犹太人与犹太社区也是研究的一大中心，从城市社会史的角度揭巢异质环境在犹太人身上展现出了对立与融合的奇特景象。^③但是国内学者对于上海“贝塔”的专门研究缺乏足够的重视，相关资料多引用希伯来语的《贝塔在中国 1929-1949，贝塔周年纪念文集（1923-1973）》、上海工部局档案以及古德施泰因的《犹太人在中国》^④。

相比之下，国外的研究著作更为详实，将远东犹太人的贡献纳入世界性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之中理解，^⑤考察母国身份的差异对于不同犹太难民的影响。^⑥有一部分学者从外交史的角度分析当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者如何在上海错综复杂的国际势力之间斡旋交涉。^⑦另外，回忆录是研究上海犹太人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史蒂夫·霍赫施塔特^⑧收集的口述史记录是唯一具有权威性的上海犹太人的口述历史档案，以色列汉学家伊莲娜·埃本以图文并茂

① 参见王志军、李薇：《20 世纪上半期哈尔滨犹太人的宗教生活与政治生活》，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西奥多·特迪·考夫曼：《我心中的哈尔滨犹太人》，刘全顺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 年；石方、刘爽、高凌：《哈尔滨俄侨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年；刘爽《哈尔滨犹太侨民史》，北京：方志出版社，2007 年；李述笑、傅明静：《哈尔滨犹太人人口、国籍和职业构成问题探讨》，《学习与探索》2001 年第 3 期；刘爽：《哈尔滨犹太人历史活动分期——以改变历史进程的重要转折点为视角的考察》，《学习与探索》2006 年第 3 期；王志军、李薇：《论 20 世纪早期哈尔滨犹太人的数量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10 年第 2 期。

② 参见潘光、陈心仪、虞卫东、周国建编：《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 年；潘光：《犹太人在亚洲：比较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年；熊月之、马学强、晏可佳选编：《上海的外国人 1842-194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唐培吉：《上海犹太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2 年；戴维·克兰茨勒：《上海犹太难民社区：1938-1945》，许步曾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 年。

③ 参见上海虹口区图书馆：《虹口历史文化研究资料汇编》，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7 年；熊月之：《异质文化交织之下的上海都市生活》，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年；吕超：《海上异托邦——西方文化视野中的上海形象》，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0 年。

④ Jonathan Goldstein, *The Jews of China. Vol. One,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New York: M.E. Sharpe Inc., 1999.

⑤ Yossi Katz, "The Jews of China and their Contribution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Jewish National Home in Palestine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6, no. 4 (July 2010), pp. 543-554.

⑥ Joseph R. Fisman, "The Quest for Status: Polish Jewish Refugees in Shanghai 1941-1949," *The Polish Review*, vol. 43, no. 4 (1998), pp. 441-460.

⑦ Gao Bei, *Shanghai Sanctuary: Chinese and Japanese Policy toward European Jewish Refugees during World War I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⑧ Steve Hochstadt, *Exodus to Shanghai: Stories of Escapes from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的形式详细介绍了 25 位曾经的上海难民，辅以当时的报纸、地图、日记作为佐证，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性，^①雅科夫·利伯曼更加详细地介绍了哈尔滨犹太人与上海犹太人的日常生活、社区基础设施等等，^②阮玛霞使用了上海工部局的档案，在上海犹太史的研究中做了一大创新，其中有不少关于“贝塔”的记录。^③除此之外，本文还使用了另外两位犹太难民的回忆录作为有限的参考。^④本文关于“贝塔”的基础认识基于皮埃尔·阿特莱斯的《定义边缘：20 世纪 30 年代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边缘化的两个例子》。^⑤加之参考了从 20 世纪三十年代到二战结束的《上海市年鉴》和《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等等档案资料，笔者试图从“贝塔”发展的角度将不同的犹太族群联系起来，为之后的学者探讨犹太复国主义视域之下的犹太青年运动提供一些帮助。

“贝塔”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青年组织？“贝塔”领导的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青年运动？关于什么是青年组织，什么是青年运动，如今已有诸多论述，相比于此，时人的看法显然更加有趣，30 年代的中国正是内外矛盾尖锐并存的时代，“青年”是十分耀眼的主题词，从五四的风潮中走出的王光祈，他在旅德期间也格外注意德国的青年文化，他认为青年运动，“是青年自己训育之意也，与青年培养一字不同。青年培养者，青年而由前辈加以训育也；更与青年保护一字不同。青年保护者，社会对于失败之青年，组织特种机关，而加以管理训育也。”他对于欧洲青年运动有深入的了解，特别提到了“德意志国性青年同盟”与“德意志犹太青年协会”之间的争斗。^⑥无论是自我革新，还是前辈训导，“训育”是青年运动最重要的任务，也是最紧迫的使命。藉此思路，笔者发现与王光祈同时代的上海犹太“贝塔”同样也经历了从“训”到“育”的过程。

3 早期的上海“贝塔”：依附于万国商团犹太队的军事组织

宏观地看，上海“贝塔”的活动从 20 世纪 30 年代初到 40 年代末这 20 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31 年到 30 年代中期为建立期，30 年代中期到 1945 年为发展期，1945 年到 1948 年为尾声。

“贝塔”在建立初期即是以军事活动为最高目标的。20 年代初，在英国对巴勒斯坦政策及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最终目标等问题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发生分歧，最终分裂成“一般犹太复国主义”和“修正派（Revisionist Zionist）”两大派。在严峻的军事对峙下，“贝塔”应运而生。“贝塔”（Betar）有双重的意义，在公元 2 世纪，贝塔要塞是犹太英雄巴尔·科赫巴抵抗的最后据点，随着贝塔要塞的陷落，罗马大军入城之后大肆屠戮，重建“贝塔”代表着犹太人的民族觉醒；同时，“贝塔”是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青年组织，其名源于以色列民族英雄约瑟夫·特鲁佩尔。特鲁佩尔是一名战士之子，他自愿参军并且被编入一个西伯利亚团，在围攻亚瑟港时失去一条手臂，但他仍然勇敢作战，被提升为上尉。在俄国的军队中，他可能是第一个具有尉级资格的犹太人。战后他迁居巴勒斯坦，筹划建军，然而在 1920 年，特鲁佩尔在叙利亚边境为阿拉伯人击杀，^⑦“特鲁佩尔”逐渐从一个民族英雄扩大为武装复国运动的精神，鼓舞犹太人摆脱政治怯懦、唤起民族意识。

① Irene Eber, *Voices from Shanghai: Jewish Exiles in Wartime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② Yaacov Liberman, *My China: Jewish Life in the Orient 1900-1950*, Jerusalem: Gefen Publishing House, 1998.

③ Marcia Reyniers Ristaino, *Port of Last Resort: The Diaspora Communities of Shanghai*,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④ Sigmund Tobias, *Strange Haven: A Jewish Childhood in Wartime Shanghai*, 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9. 山姆·莫辛斯基：《别了，上海——一个犹太少年的回忆》，余孝奇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 年。

⑤ Pierre M. Atlas, “Defining the Fringe: Two Examples of the Marginalization of Revisionist Zionism in the 1930s,” *Israeli Studies Bulletin*, vol. 9, no. 2 (Spring 1994), pp.7-11.

⑥ 王光祈：《王光祈旅德存稿》，中华书局，1936 年，第 531 页。

⑦ 王志军、李薇：《20 世纪上半期哈尔滨犹太人的宗教生活与政治生活》，第 195 页。

1929 年，中国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联盟成立。1931 年后，哈尔滨、天津的一些青年修正派分子在上海成立“贝塔”。“贝塔”办的刊物《犹太人的召唤》(*The Jewish Call*)和《挑战》(*Tagar*)，后来成了远东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的主要喉舌。可见，上海犹太“贝塔”的创建有着深厚的俄国传统。其中雅科夫·利伯曼、米利亚·伊奥尼斯(*Milia Ionis*)等等都是来自哈尔滨的青年。根据利伯曼本人的回忆录，1948 年，利伯曼接受巴勒斯坦远东办公室的任命，成为“伍斯特胜利号(*Wooster Victory*)”难民船的组长，带领 893 名犹太人从上海抵达以色列，^①从“贝塔”建立初期开始，他始终保持高度政治活跃。

上海“贝塔”的组织形态、团体建设，零散地记录在各类文献中。唐培吉在《上海犹太人》中简要提及“L.科托维契是负责人……科托维契早在 1943 年就离开上海，前往巴勒斯坦参与以色列建国运动”^②，然而这段文字缺少出处，笔者猜测此人或与《犹太人在中国》一书提及之雷拉·科托维契(*Lela Kotovitch*)为同一人，科托维契来自天津，在 1931 年之后成为上海“贝塔”的骨干。^③同样，根据利伯曼的回忆，科托维契是哈尔滨的复国主义左翼学生组织(*Ha-shomer-ha-tzair*)创始人之一，该组织一年后即被古维奇解散，以“贝塔”代之，从此古维奇成为中国“贝塔”的实际领导人。^④古维奇是拥有德俄两国革命经历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深受亚博廷斯基器重，因此古维奇的当权意味着“贝塔”的工作从青年本身转移到一个具有政治影响力、社会领导力和国际发言权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手中。根据时人王光祈的解释，这次权力的易手可以标志着中国“贝塔”运动性质的改变，从“青年运动”向着“青年培养”转型，因为“所谓青年运动者，必须不利用已成势力，不依赖过去人物，自行组织，自为训育，以良知为本，以真理为归，超然独立于一切政党之外者也。”^⑤从而能够“青年自决”。而青年培养重已有成果，重前辈训育，正是在“贝塔”，曾经的犹太难民莫辛斯基“第一次见到了巴勒斯坦的地图，也第一次听到了犹太复国主义的主张。”^⑥

从上海“贝塔”诞生的历程来看，主要由哈尔滨犹太青年建立，而且受到了亚博廷斯基的控制，根据 30 年代上海外侨的人口构成，也可以推断“贝塔”的主要成员应该是俄国犹太人。1930 年 1 月至 6 月，上海注册外侨中白俄占 81.7% (2751/3367)。^⑦而到了 1936 年，俄罗斯犹太人成为法租界外侨的主要群体，其中，中青年占据绝对多数。

性别	年龄	俄罗斯	德意志	法兰西
男性	5 岁以下	184	24	79
	5-15 岁	619	47	112
	15-25 岁	692	24	381
	25-45 岁	3024	263	819
	45 岁以上	1173	98	165
	共计	5692	456	1556
女性	5 岁以下	161	32	69
	5-15 岁	651	37	132
	15-25 岁	1168	44	97
	25-45 岁	3095	204	392
	45 岁以上	1061	48	96
	共计	6136	365	786

① Yaacov Liberman, *My China: Jewish Life in the Orient 1900-1950*, p.115.

② 唐培吉：《上海犹太人》，第 246 页。

③ Jonathan Goldstein, *The Jews of China. Vol. One,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New York: M.E. Sharpe Inc. ,1999, p.268.

④ Yaacov Liberman, *My China: Jewish Life in the Orient 1900-1950*, p.32.

⑤ 王光祈：《王光祈旅德存稿》，第 532 页。

⑥ 山姆·莫辛斯基：《别了，上海——一个犹太少年的回忆》，第 80 页。

⑦ 罗志如：《统计表中之上海》，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集刊第四号，民国二十一年，第 27 页。

性别	年龄	俄罗斯	德意志	法兰西
总计		11828	821	2342

表格 2 民国二十五年法租界人口调查表^①

上海“贝塔”成立后，积极发展成员、进行军事训练。建立伊始，上海“贝塔”只有 9 个人，里奥·汉宁（Leo Hanin）不断鼓励上海犹太青年参与，一年之后，成员跃升至 70 人。正因为上海“贝塔”早期积极扩充人员，1932 年，万国商团已经出现“犹太队”的位置。^②这一支业余的军事组织吸纳了各国籍的公民，主力包括之前在白俄军队服役的犹太人和“贝塔”成员，塞法迪犹太人则加入了英国队。在英国人诺埃尔·S·雅各布斯上尉的指挥下，“犹太队”成为犹太军旗下作战的第一批现代化军队之一，也是当时世界上唯一具有合法地位的、完全由犹太人组成的正规军。

	1936 年	1937 年	1938 年	1939 年
官佐	3	3	5	5
他级	61	93	91	119
总计	64	96	96	124
来源	《上海市年鉴·下》（民国二十五年），U-30。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1937 年，第 105 页。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1939 年，第 172 页。			

表格 3 1936 年到 1939 年犹太队规模变化

从 1936 年到 1939 年，犹太队一直保持发展的趋势，但是与其他商队的比赛成绩比较则略显颓势，表现平平。1933 年到 1934 年的胜任团员比赛中，犹太队的成绩偏居下游，胜任者与不胜任者的比例为 41:14，美国队则为 59:24，日本队为 84:4。1936 年一次来复枪比赛中，犹太队获一等奖 5 名，二等奖 9 名，三等奖 18 名；在轻便自动手枪比赛中，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4 名。^③珍珠港事件之后，国际政治环境恶化，犹太难民逐步退出了万国商团。

到 30 年代中期，上海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已发展为一支有影响的政治力量，其中以俄国犹太人为主的修正派组织占主导地位，但持“一般犹太复国主义”观点的塞法迪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仍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④由于早期的上海“贝塔”主要由俄国修正派的犹太青年组成，而被奉为圭臬的亚博廷斯基常被称为犹太人的“法西斯分子”，因此在这个阶段，准军事化的组织建设是早期“贝塔”的主要特点。

4 中欧犹太人的加入：生活共同体的建立

从 30 年代中期开始到二战结束前昔，“贝塔”规模扩大，建立子组织“贝塔之友”，由同情和支持“贝塔”的中老年犹太复国主义者组成。1936 年，上海“贝塔”正式成员约有 400-500 人，上海“贝塔之友”的成员近千人，在政治影响力上已经与上海犹太复国主义协会相匹敌，在人数上甚至超过协会成员。

1937 年日本全面侵华到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间，欧洲战局恶化，排犹、屠犹成为德国官程序化的暴力活动，不少犹太人把中国上海作为临时处所和中转中心，例如，格哈德·柯碧德（Gérard Kohbieter）将前往上海的旅途描述成“驶向黑洞之旅（sailing into a black hole）”。^⑤1943 年，《政治月刊》选译贵司康人之《上海犹太难民的政治活动》，其文用词颇厉，“在上海相当闻名的犹太人兴资·甘德尔写作了《上海犹太难民三年史》，甘德尔于书

① 《上海市年鉴·下》（民国二十五年），U-22。
② Jonathan Goldstein, *The Jews of China. Vol. One,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p.268.
③ 《上海市年鉴·下》（民国二十五年），U-30。
④ 戴维·克兰茨勒：《上海犹太难民社区》，第 35-36 页。
⑤ Steve Hochstadt. *Exodus to Shanghai: Stories of Escapes from the Third Reich*, p.64.

中已经断称,“上海已成为避难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之最大中心地”,然而这并不标志着上海是一个宜居城市,“上海不但被认一般批评为世界最不良的国际都市……因中国事变的关系,已完全成为战争区域”。^①

这次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使得上海犹太复国主义者发展了不少新成员,从此之后,中欧犹太人成为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新主体,他们主要来自德国、奥地利,有深厚的犹太复国主义背景和思想基础。顺应组织成员母国背景的新变化,“贝塔”随即在上海虹口华德路摩西会堂内设立德语分部,大约有 300 名青年参加。^②贵司康人一文虽然不乏种族主义和阴谋论的色彩,但是他断言,由于德国犹太人“播送毒素”、“与上海犹太财阀是同族关系”,因此“对东亚并无政治影响实无可能”,并且“其间一定不少是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③可以推知上海犹太人的政治影响力已经得到了一部分人的关注,由于沙逊本人对于中国革命的介入,引起在华日本势力的敌视。

中欧犹太人在离开欧洲大陆前往遥远的中国时,个体与母体文化的撕裂感一直如影随形,难免让人感觉无所适从。在当时敏感而紧张的战争环境之下,犹太青年会不会走向另一个极端,成为意大利青年和德国青年那样的好战分子?这是 1932 年 9 月 16 日《犹太时报》(*Jewish Chronicle*)发出的疑问。马萨里克在回忆录中描述捷克斯洛伐克的索科尔青年运动时,将那些训练有素的青年比作“棋子”和“机器”,这种场景被亚博廷斯基收入他的未来主义(Futurism)设想之中,成为“贝塔”的典范。

并且,“贝塔”身处的上海公共租界并非真正的“最后的天堂”,大量中欧犹太人的涌入恶化了当地华洋关系,也滋生了新的争端。对于很多欧洲犹太人来说,上海的生存条件相当险恶,从 1939 年开始,工部局已经收紧了接受犹太人的名额,工部局与日本官方从 8 月开始禁止难民进入公共租界地界,到年底仅仅颁发入界证 300 张。1939 年以来,犹太难民逃亡上海数量激增,工部局认为已经超出了公共租界能够容纳的天花板,“本局经商请领事团,设法阻止欧洲难民之赓续来沪。……沪上之不景气,以及大批难民来沪实在无法谋生”。^④1940 年爆发自来火工潮,华人工人举行罢工,工部局发言人虞洽卿与自来火公司董事嘉道理方面谈判,事件以解雇犹太裔工人告终。^⑤

除此之外,上海的卫生条件让很多来自西方的犹太人无法适应,莫辛斯基回忆家中的佣人,“每天早晨他也会把一打瓶子里灌满开水,冷却后放入冰箱。这就是我们的饮用水,因为直接喝水龙头里的水是会生病的。”^⑥莫辛斯基已经是在上海生活的第三代犹太人,相比于初来乍到的难民来说,他的家境已属上乘。1939 年初开始,斑疹伤寒在公共租界渐成肆虐之势,患此症之外侨一共 40 人,其中犹太难民 11 人,死 3 人。年中又有痢疾流行,“犹太籍难民之患赤痢者颇多”。^⑦从 5 月开始,犹太难民中患猩红热者有 30 人,随即蔓延开来,到了 5 月 28 日已经达到了 129 名,其后工部局设立隔离医院予其医治,形势转好。“犹太难民收容所卫生情况……总体令人满意”。^⑧1945 年上海霍乱流行,亦有白喉多犯,患有霍乱 653 人,白喉 158 人,另外还有其它传染病,如天花、猩红热、伤寒、斑疹、脑脊髓膜炎等

① 贵司康人:《上海犹太难民的政治活动》,郑衍译,《政治月刊(上海)》,1943 年第 6 卷第 6 期卷。

② 《贝塔在中国 1929-1949,贝塔 50 周年纪念文集(1923-1973)》,以色列,1973 年,第 87 页,转引自大卫·克兰茨勒:《上海犹太难民社区》,许步曾译,第 246-247 页。

③ 贵司康人:《上海犹太难民的政治活动》。

④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1939 年,第 60 页。

⑤ 《自来火工潮 资方反提条件》,《申报》(上海)1940 年 7 月 31 日,第 7 版;《自来火工潮 调解接近》,《申报》(上海)1940 年 8 月 8 日,第 7 版。《白俄及犹太难民均停雇》,《申报》(上海)1940 年 8 月 17 日,第 9 版。转引自潘光等编:《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 第一卷》,第 158-161 页。

⑥ 山姆·莫辛斯基:《别了,上海——一个犹太少年的回忆》,第 81 页。

⑦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1939 年,第 329 页。

⑧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1939 年,第 426 页。

等。^①当然，彼时的犹太难民已经渐渐离去了。

生计来源已成为首当其冲的问题，“贝塔”功能从军事训练慢慢扩大，向青年俱乐部转型，甚至开设职业培训课程，这在当时的犹太青少年教育中尤为重要。俄籍犹太人与中欧犹太人主要居住在法租界与公共租界，到1936年，法租界一共有六所小学，分别为法国公学、中法学校、雷米学校、安南学校、萨坡赛小学、喇格纳小学。1935年到1936年基本接受法国人的法国公学一共有418名学生，同期主要接受俄侨学生的雷米学校一共有304名学生。法国公学学费年收入为12341.83元，平均每一位学生学费为29.53元，而雷米学校学费年收入4014.5元，平均学费为13.29元，相比之下俄侨家庭的教育支出更低。^②而公共租界，1937年工部局资助的西童学校一共十五所，其中七所为日侨学校，犹太儿童主要就读的上海犹太学校一共有233名学生受到资助，另一所犹太儿童可以就读的西童汉璧礼公学则不在资助之列。^③

即便政府扶助且学费并不高昂，犹太学生的教育问题依然严峻。恩内斯特·库尔曼（Ernest Culman）认为犹太男孩的成人礼是人生中的一个转折，“越来越多的孩子到13、14岁之后就离开学校外出工作，因为父母挣不到足够的钱。”^④西格蒙德·托比亚斯（Sigmund Tobias）离开嘉道理学校转而去密尔经学院，也是因为经学院的学费更低，可以减轻家庭的教育开支。^⑤对于不少犹太难民的孩子来说，接受教育是很艰难的决定，一方面家庭需要背负一笔学费的压力，另一方面，由于“犹太”的特殊宗教背景，他们基本不可以进入天主教和基督教学校接受教育，^⑥在二战后期，大量犹太难民因为有德国和俄国、苏联的文化背景，被美国学校、英国学校等等拒之门外。作为一名犹太人，奥托·斯内普（Otto Schnepf）接受了高等教育，并且从治学严谨的圣约翰大学毕业，已属凤毛麟角。^⑦因此，“贝塔”的文化特征为犹太青少年的教育提供了另一扇窗户。对于莫辛斯基这样的俄罗斯犹太男孩来说，他的社交被天然地分为两个部分：与非犹太同学在学校中的交往、与贝塔小组在课余时间的交往。在撰写回忆录的时候，他依然对贝塔小组保持良好的印象。“在那儿的言行举止与在学校是不同的，很少有粗鲁的行为，大体上都是较严肃的谈话。我似乎能灵活穿梭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交圈里，这对我日后的生活帮助很大。”^⑧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以塞法迪犹太人领导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逐渐处境艰难，他们活动的范围逐渐缩小到英国势力范围内，并且局限于文化与经济范畴。1943年日本政府将大批“无国籍”犹太难民关进隔离区，俄国会员被划归为“中立国侨民”，他们与隔离区长官合屋和大仓周旋，协助中欧难民办理营业执照和就业证书，帮助难民获得隔离区外出通行证。由于塞法迪犹太人的领袖遭日本人拘留，俄国犹太人接手了塞法迪犹太人经营的会堂、学校、医院，承接了大量“贝塔”的组织工作，积累了从事社区工作的成熟经验。为了避免引起日本当局的怀疑和监视，他们秘密进行军事训练，在公开场合举办体育比赛（足球、网球、游泳等）和文娱活动（周末舞会、业余音乐会、演出意第绪语戏剧等）。“贝塔”举办的职业培训与文化补习也没有断绝，他们共同学习犹太宗教知识和希伯来文、意第绪语，从文化塑造的角度强调了犹太共同体概念，稳固了非正常时期的民族感情和凝聚力。^⑨虽然当时

① 《上海市年鉴》（民国三十五年），S-8。

② 《上海市年鉴》（民国二十五年），V-26-30。

③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1937年，第598页。

④ Steve Hochstadt. *Exodus to Shanghai: Stories of Escapes from the Third Reich*, p.107.

⑤ Sigmund Tobias, *Strange Haven: A Jewish Childhood in Wartime Shanghai*, 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9, Foreword.

⑥ 根据山姆·莫辛斯基的回忆，他在几次转校之后进入天主教圣芳济书院，是全校唯一的犹太男生。山姆·莫辛斯基：《别了，上海——一个犹太少年的回忆》，第173页。

⑦ 《圣约翰大学历届毕业生、肄业生名录》，熊月之、周武主编：《圣约翰大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38页。

⑧ 山姆·莫辛斯基：《别了，上海——一个犹太少年的回忆》，第150页。

⑨ 潘光、王健：《犹太人与中国：近代以来两个古老文明的交往和友谊》，北京：时事出版社，2009年，第

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如雨后春笋在上海成立，但是囿于经济封锁和全面的政治禁令，不能从收容所吸纳会员。

为什么“贝塔”在物资短缺、治安混乱的上海依然存续？很大程度上因为从训到育的“生活共同体”出现，这依然与俄国犹太人有关。上海“贝塔”在人才队伍、组织形式、文化活动中受到了哈尔滨“贝塔”的影响。哈尔滨犹太社区从1900年以来不断扩大，成为远东犹太复国主义的重镇，而1943年之后，俄犹接过了塞法迪犹太人“救济”的主动权，获得更大的政治影响力。

第一，关于人才队伍。欧洲犹太人在流散的历史中延续了“隔都”的生活模式，在恶劣的环境中组建起完整的社会共同体。虽然“贝塔”属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的组织，与传统的犹太教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在哈尔滨，犹太复国主义和传统的拉比犹太教是共存的，民族与宗教的结合给了“贝塔”生存的空间。在基谢廖夫拉比的坚持下，宗教依然是犹太社区的核心，他坚持“贝塔和马卡比不要在安息日的除夕举办青年人活动”。^①在向青年人讲解教义时，基谢廖夫引入犹太复国主义的元素，将青年人吸引到宗教中来。泛政治化的气氛让“贝塔”的面相更加温和。

而上海则为“贝塔”铺垫了独特的生长环境。在大多数西方“过客”的笔下，上海“接受了西方正统文化的负面价值，容纳了西方道德、秩序、法律、宗教信仰所禁止的那些方面，它几乎被看作异教的罪恶之城，充满着可以打破禁忌、放纵欲望、回归原始的期待。”^②在近代中国上海，存在很多社会寄生性的组织和半转型的机构，与陈旧的帝制还存在勾连的关系，因其自由而易陷于无序，因其无序而自成体系。时人评价，“（上海）这不是一个混合体，而是无法融合的一个个独立的性质纠缠在一起的结果。上海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唯一。”^③到了二战后期，参与“贝塔”已经成为大多数上海犹太青年的选择。同样，1939年，哈尔滨“贝塔”在沉寂十年之后重新活跃起来，一共150名青年人，几乎占据哈尔滨犹太青年的一半，考夫曼评价“贝塔”是“犹太人在哈尔滨唯一的积极运动”。^④

第二，关于组织能力。由于欧洲犹太人在大流散时期已经形成了宗教维系的社会共同体，尤其是犹太会堂为共同体形成提供了情感场域，考夫曼曾经多次提到哈尔滨犹太人大多从沙俄的“栅栏区”迁移而来，保存了小社群的治理经验。在犹太复国主义和德国青年运动传统的启发下，“贝塔”组织超越了军事组织的功能，越来越向一个“生活共同体”靠拢，这样的生活共同体不是由地方政府建立的，而是由当地的犹太人在互动、信任的基础上形成的互相支持的团体，因此在评估犹太青年的生存机会上，群体的因素较于个人因素而言更加重要，这有赖于每一位居民的参与，有赖于组织与每一位居民发生关联。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1932年哈尔滨水灾中哈尔滨犹太人的自救组织。哈尔滨自从1932年7月15日以来，接连大雨，“北满一带发生二十年来未有之大洪水、以哈尔滨为中心……哈尔滨完全陷于孤立之境”，^⑤交通线几乎全面崩溃，“松花江水标比埠头区已高六七尺……埠头区内，水已越堤防侵入，截止到8日，全市三分之二已成泽国，损害甚大，没水房屋三万五千户，被水冲坏者千户，半坏者二千五百户，死伤人数二百五十，损失额八百万元”，^⑥而犹太人贫病救济会和犹太医院位于道里东商市街，哈尔滨犹太妇女慈善救济会、犹太免费食堂位于埠头区炮队街^⑦，受灾情形可想而知。“人们提起任何洪灾前后所发生的事情时，

113页。

① 西奥多·特迪·考夫曼：《我心中的哈尔滨犹太人》，第48页。

② 吕超：《海上异托邦——西方文化视野中的上海形象》，第86-87页。

③ Julius R. Kaim：《关于上海的对话》，《黄报》1939年7月1日，转引自潘光等编：《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 第1卷》，第233页。

④ 西奥多·特迪·考夫曼：《我心中的哈尔滨犹太人》，第53页。

⑤ 《北满洪水为灾》，《申报》（上海）1932年8月4日，第4页第8版。

⑥ 《松花江水灾益险恶》，《申报》（上海）1932年8月10日，第9页第1版。

⑦ 刘爽：《哈尔滨犹太侨民史》，第62-65页。

都不忘记提起这场水灾以作参考，因为没有什么比这更可怕了”。^①但是，在 1932 年大洪水期间，犹太人成立了救助难民委员会，“他们发布水灾报告书，组织救援和犹太青年参加抢险救灾……水灾之后，考夫曼医生又参加了哈尔滨市组织的五人防治霍乱小组”，^②在考夫曼的回忆中，“一个犹太人也没有为此丧生。”犹太领袖向难民提供食物和水，犹太医生坐船四处出诊，而“贝塔青年把灾区的犹太人输送到犹太会堂的二楼。”哈尔滨“贝塔”也多次承担难民的接待任务，其组织能力受到了考夫曼的高度评价。

然而由于时局动荡，日本占据东北建立满洲国，犹太人的行动没有受到广泛的关注，《申报》在 8 月 14 日转载了《大美晚报》的一则讯息：因受灾严重，俄侨电沪乞求赈济，8 月 14 日俄移民委员会主席梅慈勒（E.Metzler）发电报回复“哈尔滨灾民救济委员会”，各个白俄团体将先行垫付，以解燃眉之急。^③大部分的哈尔滨犹太人从俄国迁移而来，在各种文书中经常被统归为“白俄”，这里的“哈尔滨灾民救济委员会”很可能就是犹太人成立的救助难民委员会。

第三，关于文化活动。“贝塔”为犹太青年提供了精神的归宿，让他们摆脱了浪子与“文化杂种”^④的两难选择，“贝塔”的最终目的是挽救年轻犹太人的灵魂，反对与非犹太人通婚，防范苏联的思想宣传和意识形态同化。^⑤当时“贝塔”作为年轻人云集的组织，是青年追逐的社交平台，加入“贝塔”是一种风尚和潮流，可以作为吸引异性的资本。雅科夫在回忆哈尔滨“贝塔”的时候谈到，他在那里碰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当时“贝塔”的娱乐区域叫做“ploshchadka”（字面意思为“平坦的地面”），包括操场、花园、贝壳状的户外舞台等等，而“贝塔”机构设在一栋大楼里，有练习拳击和其他体育运动的地方。^⑥

同样，相似的活动在上海重现，有聚餐讨论、共同远足和义卖会等。亚博廷斯基曾经向贝塔青年发出呼吁，希望他们能够学习德国的青年漫游传统。德国青年运动是一场广泛的思想碰撞和部分程度上的思想实践运动，青年们希望通过漫游，在尚未受到现代性侵染的民间文化中重构德意志民族的生活方式，以此构建出一种区别于“西方”社会模式的共同体，重新回到自然中寻找民族适合的生存状态。集体性的探索活动跨越了几千公里，在亚洲最东端的上海重演，山姆·莫辛斯基在他的回忆录中专门用一个章节谈到了“贝塔”，“（‘贝塔’所在的俱乐部）气氛很融洽，我很喜欢去那里。我还在那里与很多人成了一辈子的朋友”。^⑦

当然，上海“贝塔”也表现出特殊的文化属性。“贝塔”之所以能够一直活跃于上海，也因为青年看待上海带有与中年人不同的视角。当时大多数难民只是将上海看作临时落脚点，他们对待战局和未来持有悲观迷茫的态度，犹太女演员邵莎娜·卡汉（Shoshana Kahan）在日记中这样记录：（上海）一个肮脏和恶心的地方，虹口是上海最贫穷和肮脏的地方。^⑧丽斯贝斯·吕文博格（Lisbeth Loewenberg）将那段上海记忆称之为“心理包袱”，^⑨工作的不稳定和生活的黯淡无光浇灭了他们对于异乡文化的期待。

但是上海作为一个异质文化交织的远东大都市，对青年人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尤其是那些出生于上海的“新上海人”（Shanghai Lander），他们更喜欢走出隔离区，走出虹口区，来到华人世界，饶有兴趣地看中国人的婚丧仪式。在回忆上海生活时，他们用“令人兴奋”、“嬉

① 西奥多·特迪·考夫曼：《我心中的哈尔滨犹太人》，第 81 页。

② 刘爽：《哈尔滨犹太侨民史》，第 66 页。

③ 《白俄各团体将为被灾白俄募捐》，《申报》（上海）1932 年 8 月 14 日，第 15 页第 8 版。

④ 吕超提出“文化杂种”的概念，认为上海特殊的文化环境也孕育出一类人群，他们来自西方但却并不完全认同西方文化，与母国文化格格不入，反而异常迷恋老上海这个文化冲突的焦点城市。见吕超：《海上异托邦——西方文化视野中的上海形象》，第 87 页。

⑤ 王志军、李薇：《20 世纪上半期哈尔滨犹太人的宗教生活与政治生活》，第 197 页。

⑥ Yaacov Liberman, *My China: Jewish Life in the Orient 1900-1950*, p.37.

⑦ 山姆·莫辛斯基：《别了，上海——一个犹太少年的回忆》，第 77-81 页。

⑧ Irene Eber, *Wartime Shanghai and the Jewish Refugees from Central Europe: Survival, Co-Existence, and Identity in a Multi-Ethnic City*, Berlin: De Gruyter, 2012, p.160.

⑨ Steve Hochstadt, *Exodus to Shanghai: Stories of Escapes from the Third Reich*, p.5.

耍玩乐”来评价那段岁月。一名犹太人在回忆录中写道：“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建立在这些孩子的美好友情之基础上，这种友情是我在美国难得见到的。自然，由于人或多或少都遇到这种情况，因此我怀疑，我们这些孩子是否非常意识到这一点。”^①事实上，我们很难孤立地从宗教的角度，或者从政治运动的角度看待“贝塔”发挥的历史作用，而更应该着眼于以“贝塔”作为身份标志与集体认同的犹太青年，看到他们独特的身份背景与成长环境，从中最大可能地复原出“贝塔”与青年结合产生的生动而具象的图景。

5 “阿利亚”行动：“贝塔”的政治军事化与族群单一化

随着二战的结束，国民政府对于犹太难民的“清理”陆续开始。《上海市年鉴》（民国三十五年）记录了行政院于民国三十四年颁布的《附录一 处理德侨办法》与上海市德侨处理委员会颁发的《附录二 上海市处理德侨办法施行方案》。本文节录《附录二》相关内容如下：

“第四条 收复地区及后方德籍人民，旧奥籍人民及德籍犹太人，未犯有本办法第二条所列**事者，除非内政外交两部核准继续居留中国外，应予全部遣送回国。在未遣送前，得具殷实*保……暂时继续居留。其不能具保者，应有该省市政府集中管理。第五条 旧奥籍人民及德籍犹太人与德籍人民，如为忠实可靠之技术人员，复由公私***准内政外交两部，予以复用，免于遣送回国。”^②虽然国民政府将德籍犹太人与德籍人民、德籍教士、旧奥籍人民分开处理，但是德裔犹太人的问题只是处于“暂缓解决”的状态，国民政府拒绝德日外侨的归化请求。“有嫁与日侨之犹太人要求恢复其国籍身份者，均继市政府及主管当局一一退回，均未受理。……中德迄未恢复邦交，仍以敌国视之。”^③约有四分之一的犹太人回到德奥，根据国民政府“返回原籍”政策，可以推知“贝塔”失去了一大批德奥籍成员，对于前途茫然的青年人来说，复国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政治干预和政治灌输，不如说是在战时环境的挤压下，“贝塔”在“训”与“育”的结合中强化了“阿利亚（Aliyah）”的神圣性和正确性，奥托·斯内普说“我怀着信念成为一名复国主义者，当初我别无选择地逃离欧洲的人间地狱，在那里我只是一个青年人，非常无助，所以身份对我来说很重要，把我推上复国主义道路，我想去以色列。”^④

为了集中力量为以色列的建国输送大量军事人才，“贝塔”为离开中国做最后的思想培训。根据莫辛斯基的回忆，1947年开始，贝塔成为他日常的生活内容，随着联合国投票表决近在咫尺，“贝塔”的内容越来越与政治有关，“我们开始接受犹太复国主义历史的教育，特别是侧重于有感召力的领导人弗拉基米尔·亚博廷斯基和他的继任者梅纳赫姆·贝京的教义和人生观。”^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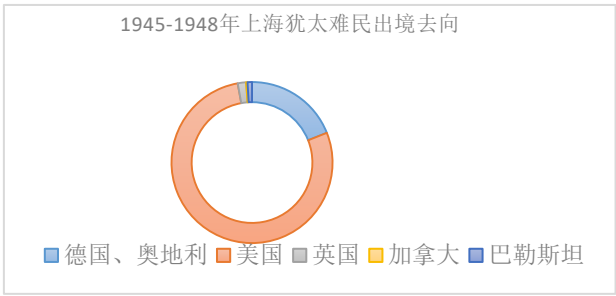


图 2 1945 年到 1948 年上海犹太难民出境去向^⑥

① 戴维·克兰茨勒：《上海犹太难民社区》，第 260 页。

② 《上海市年鉴》（民国三十五年），A-31。

③ 《上海市年鉴》（民国三十五年），G-10。

④ Steve Hochstadt. *Exodus To Shanghai: Stories Of Escapes From The Third Reich*, p.223-224.

⑤ 山姆·莫辛斯基：《别了，上海——一个犹太少年的回忆》，第 150 页。

⑥ Steve Hochstadt. *Exodus To Shanghai: Stories Of Escapes From The Third Reich*, p.189.

1947年4月，上海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举行一系列示威活动，抗议英国当局在巴勒斯坦处死4名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其中4月22日在霍山公园举行的一次集会有8000多人参加，是上海犹太社区近百年规模最大、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政治性活动。到11月，随着巴勒斯坦的冲突白热化，上海“贝塔”建立了伊尔贡上海分部（也称中国分部或远东分部）。在毕勋路20号“贝塔”总部内，该团体设有秘密武器库和军训场所。同时，上海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派代表拜访或写信给中国各界名流和政府要人，宣传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对巴勒斯坦问题的立场。1948年，上海“贝塔”和伊尔贡也想方设法用船将获得的军火及一批受训人员送往以色列，后因种种复杂原因而未能成功。^①5月14日以色列国宣告成立的消息传来，上海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举行了各种形式的庆祝活动。随着第一次中东战争的爆发，伊尔贡总部紧急要求上海犹太复国主义团体尽快向巴勒斯坦输送人员，上海“贝塔”和伊尔贡先后选派了两批骨干分子前往巴勒斯坦，一批由S.马勒(Samuel Muller)带领，另一批由A.马林斯基(Arye Marinsky)带领，两批武装于1948年秋先后到达巴勒斯坦，后不少战士升任以色列军队军官。^②

1948年12月，在以色列政府向上海犹太人签发了7000份签证后，几乎所有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骨干分子前往以色列，上海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活跃了近50年后逐渐波平浪静，不断隐退，最终成为一个历史话题。

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划分也有简单化、片面化的缺点，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国籍的犹太人发展的历程有所不同，波兰犹太人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犹太人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团体，在平时的活动中，与德国犹太人和俄国犹太人总是保持着距离。而且，并不是所有犹太人都信仰犹太教，有一些人具有犹太血统或者部分犹太血统，但是已经改信基督教；还有一部分犹太人属于左翼人士，其中的前德国共产党成员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著名的汉斯·希伯参加了抗日战争，牺牲在中国的土地上。^③

如果上海犹太青年是一个有机整体，那么贝塔组织仅仅是其中的基层细胞，依然有其他青年游离于政治生活之外，他们对于复国主义描绘的宏图伟景并不十分关心，在回溯历史和研读神圣文本之中，寻找已经被大屠杀打破的信仰。例如，西格蒙德·托比亚斯作为上海犹太难民中一名特殊的学生，讲述了在密尔经学院(Mir Yeshiva)经历的与“贝塔”青年完全不同的宗教性的生活。他记录了一次上课的见闻：

“弗瑞达问经学院的老师，‘如果上帝真的存在，那么他为何坐视犹太社区中最博学、最虔诚的人们被如此屠杀呢？’老师说：‘如果你想打一个人耳光，你会打他的脸。’”^④

他对于寻欢作乐、四处闲逛的生活不以为然，如果不能将时间花在研读《托拉》和《塔木德》上，那就是一种“罪”。与一般的“贝塔”青年不同的是，经学院师生完全将自己隔绝在世俗的情感生活之外，这种清心寡欲的生活是经学院的学生面对逃难的一种姿态，一种赎罪的姿态。密尔经学院是另外一种集体生活的形式，在深居简出的学校生活中，学生通常以小组的形式解释《塔木德》，有时候也互相指正错误，“我们很少安静不动地学习，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唱诵吟咏，伴以手势作强调。”^⑤

根据托比亚斯的回忆，在他就读的时候，密尔经学院一共有大概250-300名学生。在波兰时，密尔经学院的学生生活清贫，勉强能够维持温饱，但是在这里，由于战时普遍的食品缺乏，经学院的学生反而有更稳定的生活来源，他们学习时间更长，而学校内部的衣食住行受到了美国的资助。因此，为了节约家庭的开支，托比亚斯的父母让他从嘉道理学校退学，

① 潘光：《犹太复国主义在上海的兴衰及其活动特点》，《史林》，1994年第2期，第54-55页。

② 戴维·克兰茨勒：《上海犹太难民社区》，许步曾译，第252页。

③ 潘光、周国建、周晓霞：《艰苦岁月的难忘记忆——来华犹太难民回忆录》，北京：时事出版社，2015年，第71页。

④ Sigmund Tobias, *Strange Haven: A Jewish Childhood in Wartime Shanghai*, p.57.

⑤ Sigmund Tobias, *Strange Haven: A Jewish Childhood in Wartime Shanghai*, p.62.

转去经学院读书。^①。在这本回忆录中，除了讲述犹太难民的生活，西格蒙德·托比亚斯也看到了上海下层妓女和苦力的艰难生活，这是在其他回忆录中很少见的。

6 结语

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上海作为犹太人最后的安全港湾，将这两个古老民族紧紧联系在一起。上海“贝塔”的建立丰富了上海的城市历史，也拉近了中国人与犹太人之间的距离，多种多样的体育赛事、演出活动和游行提升了犹太人的国际形象，“贝塔”作为青年组织的一种尝试，将政治学习、宗教习得与社会教育结合在一起，防止青年人陷入沉沦的深渊。犹太人李莉·芬克尔斯坦在回忆录中写到：“我们发现中国邻居非常友好，他们知道我们的处境是多么艰难，但他们并没有利用我们的困境牟利。不要忘记，他们都是最穷苦的老百姓，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②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中国学者一直强调上海是犹太人的“诺亚方舟”，但是在很多回忆录中，犹太难民中的年轻人对于中国人的印象是游离而隔阂的。首先，1937 年之后的上海，并不是由中国人控制的上海，日本人是犹太人主要的生存威胁。在回忆录中，特别是在巴拉德那本著名的《太阳帝国》小说中，中国人的形象是“狡猾与隐忍”，“大喊大叫与沉默寡言”并存的。

其次，从欧洲逃亡上海的难民缺乏基本的生存能力，难民之中医生占据多数，而中国人很少会找犹太医生看病，这些赤贫的医生又因为身份问题难以融入洋人世界，如果他们转而去街头杂耍、去工厂做工，那么必然与中国人产生生存竞争，“自来火事件”即可见一斑。

对于在上海已经生活多年的白俄犹太人和“新上海人”来说，欧洲战场不过是“知识性记忆”的一部分，他们缺乏关于大屠杀的感官记忆。中国人是仆役、职工，他们是带给中国人生活来源的“老板”、“主人”。莫辛斯基在离开上海的时候，对中国共产党没收他们家的工厂多有怨言。他惋惜、回忆的是“作为童年生活空间的白人上海”，不是“中国人接纳落难者的上海”。可以说，这些犹太人共同构成了近代中国殖民与反殖民历史，他们天然与中国共产党对立，是构成上海混乱和伤痛记忆的一部分。

最后，日据上海也笼罩在似有若无的反犹空气之中，1943 年的犹太难民并不会预知战争会在 1945 年结束，他们被迫从公共租界的狭窄房屋搬到日军建立的“集中营”中，种种形势确实有向欧洲靠拢的趋势。伴随着二战的结束，中外对立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出来。奥托·斯内普回忆，1945 年之后，有中国妇女将孩子推在他面前借此讹钱。^③阮玛霞提出，中国人的反犹情绪一直不甚明显是因为对于中国人来说，犹太人与其他西洋人并没有明显的区别。从 19 世纪以来，中国报刊上关于犹太人的信息只停留在现象描述的层次上，报道关于欧洲犹太人经历的种种屠杀，对于“贝塔”几乎没有记录。回忆录和访谈都带有后天杜撰的成分，难以作为“中犹友好”的例证。关于 20 世纪 30 年代到 40 年代的上海华人与犹太难民的关系，似乎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① Sigmund Tobias, *Strange Haven: A Jewish Childhood in Wartime Shanghai*, xviii.

② 吕超：《海上异托邦——西方文化视野中的上海形象》，第 100 页。

③ Steve Hochstadt, *Exodus to Shanghai: Stories of Escapes from the Third Reich*, p.181.

参考文献

一、论著

1. 王光祈：《王光祈旅德存稿》，中华书局，1936 年。
2. 曹卫东主编：《德国青年运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年。
3. 虹口区图书馆：《虹口历史文化研究资料汇编》，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7 年。
4. 大卫·克兰茨勒：《上海犹太难民社区》，许步曾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2013 年。
5. 潘光、王健：《犹太人与中国：近代以来两个古老文明的交往和友谊》，北京：时事出版社，2009 年。
6. 唐培吉：《上海犹太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2 年。
7. 许步曾：《寻访犹太人：犹太文化精英在上海》，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年。
8. 山姆·莫辛斯基：《别了，上海——一个犹太少年的回忆》，余孝奇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 年。
9. 熊月之：《异质文化交织之下的上海都市生活》，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 年。
10. 吕超：《海上异托邦——西方文化视野中的上海形象》，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 年。
11. 熊月之、马学强、晏可佳选编《上海的外国人 1842-194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
12. 熊月之、周武主编：《圣约翰大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
13. 石方、刘爽、高凌：《哈尔滨俄侨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年。
14. 西奥多·特迪·考夫曼：《我心中的哈尔滨犹太人》，刘全顺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 年。
15. 潘光：《1840 年以来香港、上海犹太商集团的发展和兴衰——兼论港沪犹太社团对中国的影响》，《犹太人在亚洲》，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年。
16. 刘爽：《哈尔滨犹太侨民史》，北京：方志出版社，2007 年。
17. 《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
18. 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倪静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年。
19. Bei, Gao. *Shanghai Sanctuary: Chinese and Japanese Policy toward European Jewish Refugees during World War I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20. Eber, Irene. *Voices from Shanghai: Jewish Exiles in Wartime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21. Eber, Irene. *Wartime Shanghai and the Jewish Refugees from Central Europe: Survival, Co-Existence, and Identity in a Multi-Ethnic City*, Berlin: De Gruyter, 2012.
22. Goldstein, Jonathan. *The Jews of China. Vol. One,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New York: M.E. Sharpe Inc., 1999.
23. Hochstadt, Steve. *Exodus to Shanghai: Stories of Escapes from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24. Liberman, Yaacov. *My China: Jewish Life in the Orient 1900-1950*, Jerusalem: Gefen Publishing House, 1998.
25. Ristaino, Marcia Reynnders. *Port of Last Resort: The Diaspora Communities of Shanghai*,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26. Tobias, Sigmund. *Strange Haven: A Jewish Childhood in Wartime Shanghai*, 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9.

二、论文

1. 陈浩田：《国内关于犹太复国主义问题研究述评》，《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1 期。

-
2. 王健：《上海犹太人与抗日战争》，《上海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05 年。
 3. 李述笑、傅明静：《哈尔滨犹太人人口、国籍和职业构成问题探讨》，《学习与探索》2001 年第 3 期。
 4. 刘爽：《哈尔滨犹太人历史活动分期——以改变历史进程的重要转折点为视角的考察》，《学习与探索》2006 年第 3 期。
 5. 王志军、李薇：《论 20 世纪早期哈尔滨犹太人的入数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10 年第 2 期。
 6. Atlas, Pierre M, “Defining the Fringe: Two Examples of the Marginalization of Revisionist Zionism in the 1930s,” *Israel Studies Bulletin*, vol. 9, no. 2 (Spring 1994): 7-11.
 7. Katz, Yossi, “The Jews of China and their Contribution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Jewish National Home in Palestine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6, no. 4 (July 2010): 543-554.

三、原始文献

1. 潘光、陈心仪、虞卫东、周国建编：《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第一卷 文件报刊》，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 年。
2. 罗志如：《统计表中之上海》，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集刊第四号，民国二十一年。
3. 《上海市年鉴》（民国二十五年）、（民国三十五年）、（民国三十六年）。
4.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1937 年）、（1939 年）、（1940 年）、（1941 年）。